

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当代建构

赵欢春

内容提要 话语是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话语与权力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话语权作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在现代国家的演进过程中与国家意识形态完成了历史联姻,生成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思想主导权”,并呈现出特定的现实图景。意识形态话语权彰显了一个政党政权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力量。就当代中国而言,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已是当务之急。其核心要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物质基础是提升国家实力、打造理论队伍、建设话语平台;其根本方法是凝练好话语主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话语权 当代建构

赵欢春,南京审计大学副教授 211815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东西方意识形态交锋复杂而尖锐。为此,习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这就要求我们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意识形态话语权彰显了一个政党政权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力量。就当代中国而言,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理论研究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议题,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亦是当务之急。

一、话语与权力:福柯关于话语权的一个分析模型

1. “话语”即关系:话语是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20世纪中后期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其思想体系中,关于“话语”(discourse)问题的研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福柯看来,“话语”从广义上

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暨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2015MZD048)和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研究”(15BKS086)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08月20日 19:09:11 来源:新华网。

讲,是指“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而狭义上的“话语”接近“语言的形式”。但“话语”既不是简单地、个别的字词的结合,也不是仅仅被限定在规则中的意义。

接着,福柯从本体论的视角来阐释“话语”的内涵。他指出,“话语”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交往和传播的“中介”。在福柯看来,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一种“话语”关系^[1]。

进一步,福柯从本质论的意义上指出,“话语”是人类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它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复杂的现实关系。在福柯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所构成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它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2. “话语”即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上述“话语”理论的基础上,福柯考察了推动“话语”运动的动力机制,并把“话语”放置到社会整体领域来关照。其指出,权力是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话语”是权力的外衣,只有依赖于“话语”才能实现真正的权力。在福柯看来,权力在话语之先。这里的权力并不仅仅特指统治阶级或者执政当局所拥有的强制力、征服力,而更多地指影响力、辐射力、说服力。福柯认为,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有特定的“话语”存在,这些“话语”组合起来,如同一个缜密的网络,驾驭其成员的思维、行动及组织的规范或条例,使该社会的所有活动都受着这种特定“话语”定义的限制。这里“话语”的作用,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运动。

福柯进一步指出,权力推动了话语,话语也加强了权力。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话语,话语累积起来、扩展开来形成学科,学科又组成公共机构(如高校、监狱、医院等);反过来,学科和公共机构又成为话语栖居和生产的场所。在福柯看来,权力是知识生产的原初动力。权力话语的活动生产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知识生产系统推出的观念、价值、意义渗透到全社会,牢牢地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行动。

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所有话语都由权力产生,但它们并不全对权力俯首帖耳。“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但也可以是阻碍、绊脚石、阻力点,也可以是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2]

从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两者的关系:话语是权力的产物,也可以说权力是话语的产物,两者犹如孪生兄弟。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争夺话语实质上就是为了争夺权力,而争夺权力也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来实现。话语不仅仅是权力的附庸,它一旦被权力产生出来就又能动地具有生产权力的功能和作用。这正是权力总是争夺并控制话语的原因所在。历史上,对社会既定权力布局的解构乃至颠覆,往往总是首先表现为对权力话语的解构或颠覆,而权力对话语的控制正是对其产生异质权力功能的控制。因此,一定的相对稳定的权力布局总是必然要与一定的同质的相对稳定的话语布局形成稳定而又牢固的联盟关系。

二、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关于“思想主导权”的一种运作框架

1. “思想主导”何以可能:话语权的一般特征及其特殊意蕴

话语权是一种掌握、控制、支配和阐释“话语”的权利与权力。它一般通过议题设置、叙述策略等

[1]转引自王志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2][法]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多种手段,运用说服、诱导、感染、暗示等方式以支配和掌握舆论导向,使人们自愿地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考察话语权的特征。从静态看,“话语权”首先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表达观点、陈述意见的权利。从动态看,“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就意味着政治地位的争夺,在社会变革之际,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谁就具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和控制权,谁就能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1]。从结果看,话语权的获得和丧失主要不取决于话语层面,而是取决于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则最终取决于各种现实因素的综合,取决于现实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也就是说,话语权的强弱大小,不仅跟话语者本身的政治经济地位紧密相关,而且还跟话语体系本身的现实解释力与理论影响力密切相关。

话语权又被称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有两个层面的特殊意蕴:一是话语本身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即所谓的“软权力”。二是话语传播者通过对媒介的控制而拥有传播信息的权力,即“话语掌控力”。就第一层含义来说,“软权力”依靠的是一种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它不同于“硬权力”,即使用军事和经济因素使人转变立场,大多运用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等手段来实施。“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2]。亚当·斯密说,人在自由市场上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做出判断和决策;那么在思想市场上,这只无形的手就是“软权力”,无需胁迫和交易,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会把人们聚拢在一起。对一个国家来说,“软权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

就第二层含义来说,“话语掌控力”侧重于从话语传播的角度对特定对象施加影响力。在现当代,这种“话语掌控力”越来越彻底地被话语新媒介所造就。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智能手机的普及化,改变了传统的话语媒介。新媒介已成为一个特殊的战线:一个话语权争夺的领域,一个国家力量借以设置社会议题、价值引领乃至控制社会舆论的平台。正如德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所言:“基于集体意识和共同想象而形成内在联系的社会,是存在于媒介(运作)中的。”^[3]

2. “思想主导权”的生成: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历史联姻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必然会努力与话语权结合在一起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与话语权有着紧密的联系,“话语‘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即它的内容、形式和倾向都映射着权力,而这种权力关系的系统再现,则成了意识形态”^[4]。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某种具体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而一定社会的话语在其生成的过程中必然会打上特定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烙印。意识形态话语权必然成为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实现其利益的工具,继而必然成为他们争夺的目标。现实社会中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正如有研究指出“意识形态冲突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由谁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制度选择,是领导权之争”^[5],体现了话语者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掌控权的追求过程。

一般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民众就会自愿遵循,其他国家自然愿意效仿,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缔造出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制度体系(包括国际规则),那么在

[1]朱兆中:《当代中国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2][美]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3][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 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4]李兰芬:《我国道德话语权的现状及其对策》,[北京]《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

[5]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别国眼中,其行为就更具合法性。正所谓“当这些国家借助机制和规则鼓励别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代价高昂的‘胡萝卜’和‘大棒’了”^[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制度体系能增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凭借缔造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推行了自己的价值观。英国主张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美国着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在人们看来,这些规则和制度与英美体系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特性是一致的。又如,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动员全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国际社会,我们又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增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和国际规则,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从而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由此看来,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无形的实力,是非常珍贵的思想资源,更是一种重要现实,它作为“影响舆论的力量”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国际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话语权大部分来自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2]。有些国家的舆论影响力远远超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比如挪威,它将经济援助、和平调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纳入了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在过去20年中,挪威积极参与了菲律宾、巴尔干、哥伦比亚和中东等地的和平谈判,这种和平缔造者的姿态使挪威的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树立起积极的形象。

3. “思想主导权”的运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图景

具体环境中,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各种表现形式。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拥有自身逻辑性和严谨性的表现体系。根据情况不同,可以是电影、图像、神话、想法或者观念,是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所具有的一种存在性和历史角色。

以好莱坞电影为例。在《阿凡达》等电影中,美国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未来的视野以及乌托邦式的设想,建立在一整套诸如“应许之地的、丰饶土地上的、新伊甸园式的”神话基底上,表面上看似与美国政府推广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联系。但是,雷吉斯·迪布瓦在《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揭露出这样的事实:美国政治权力始终对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从而使美国意识形态被彻底地植入好莱坞电影的形式和结构之中。好莱坞电影的诸种形式和结构暗合了美国历来倡导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修辞^[3]。一位法国前外长曾评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激起人的梦想和渴望,这要归功于其散布在全球的影视形象,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大批学生纷纷从其他国家奔赴美国求学深造”^[4]。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电影皆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无论是隐含其中还是鲜明彰显,每一部电影都归结于一种主观的独特的世界观。本质上,电影图像作为生活的再现,与生活本身一样具有相等的介入性,也就是说完完全全的介入。而且电影又对金钱势力(这里指资本)具有依赖性。因为“做”一部电影很贵,因而,它永远都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总要先建立舆论,取得道义上的广泛认同;而巩固一个政权,则总要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统治思想,成

[1][2][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第12页。

[3][法]雷吉斯·迪布瓦:《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李丹丹、李昕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页。

[4]休伯特·韦德里纳、多米尼克·莫伊西:《全球化时代的法国》(Franc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为社会的普遍共识。”^[1]

时至今日,在国际地缘政治极端复杂尖锐且超常波诡云谲的大背景下,美国意识形态的彰显依然通过好莱坞的电影制片机构锁定战略目标国。从而对目标国的民众形成一种潜在的、深刻的影响,达到重塑他们的视觉思维和听觉类型,重新定位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乃至重新整合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目的。雷吉斯·迪布瓦在著作中深入精辟地揭示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从主题、叙事和美学层面在电影内部发挥作用的。例如,由在苏联境内遭禁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改编的电影,直接参与了渗透、演变、颠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颜色革命。美国中情局直接参与了该文学作品的改编以及电影的拍摄、发行和放映的各个阶段。所以,我们务必清醒地认识到:不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理论工作者还是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必须透过好莱坞电影的华丽场面和感官刺激,理性地对其进行文化解码,避免被令人眼花缭乱影像建构的迷人幻想彻底蒙骗和误导。

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力量

意识形态话语权“既不是单纯的话语技巧,也不是神秘的精神支配。而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力量进行思想统治的方式”^[2]。它彰显了一个政党政权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一个失去话语权的政党必定失去民心,其解体就在所难免。意识形态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政党言说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思想主导权”。因此如何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是现代国家不能不关心的重大课题。就当代中国而言,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已是当务之急。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建构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核心要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也绝不是一句空话。有了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才从无机的大多数成为有机的历史主体,成为世界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我国当前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焦点是共产党的领导。”^[3]敌对势力为此推出了诸如“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等一系列伪命题,企图制造坚持党的领导同民主、法制、廉政建设的根本对立。同时极力宣扬“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观念,其险恶用心都是企图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在构建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历史任务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便无从谈起。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庄子·人间世》)。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在西方眼中是“东亚病夫”,奴性有余而骨气不足。“资本主义”、“维新主义”、“改良主义”等等“主义”都没有真正支撑起中国人的脊梁骨。但是“自从中国人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4]。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中国人精神上的钙,是我们构建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思想内核。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就成了“空心萝卜”,失去真理力量的话语注定没有生命力。

2. 提升国家实力、打造理论队伍、建设话语平台,是拥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物质基础。

话语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争取的。立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为了拥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必须具备三个物质基础。

[1]侯惠勤等编著:《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著作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3]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贵阳〕《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其一,提升国家实力。国家实力越强,越容易拥有强势话语权。二战后的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全世界长期拥有强势话语权。一个没有独立主权、积贫积弱的国家不可能有尊严,自然不会有话语权,更谈不上强势话语权。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掠夺和侮辱,国力衰微、主权沦落、民心涣散;再看今日之中国,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201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呼之欲出,这无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话语支撑,并助推其成为世界的强音。因此,我国在制定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略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围绕国家的发展大局,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发言,使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强与国家实力的可持续发展相得益彰”^[1]。

其二,打造高水平理论队伍。任何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的建构,都必须由一个专业化的理论队伍来实施,这支队伍担负着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的历史任务。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2]。改革开放以来,这支理论队伍为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建树。但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这就要求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在秉承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前提下,善于提炼标识性话语,打造易于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为此,我们还要建设一支反应快、能战斗,有深度、有远见,懂政策的高素质的理论队伍。在信息高度开放交互的互联网时代,这支理论队伍既要兼顾官方的和民间的,又要统筹国内的和国外的,最好专业的、业余的都有,从而形成一支沉底盖边、结构科学的有战斗力的理论队伍体系。

其三,建设强势话语平台。在互联网、新媒体、智能手机迅猛发展的时代,话语权早已不是仅仅凭借口舌和笔墨发挥作用了,除传统公共官方媒体外,涌现出了基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诸如微博、微信、QQ;喜马拉雅听、人人网、BBS;网络电台、直播间等等新兴话语平台,使得话语平台呈现智能化、多样化、分散化、微型化、嵌入化等特点。这为扩大话语权提供了扁平化的话语交互平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辐射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同时,也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新的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话语权的主战场,美国政府叫嚣“中国黑客论”、“网络威胁论”就是他们企图抹黑中国、霸占网络话语平台的险恶用心的典型表现。正是由于话语平台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网络安全和手机网络发展战略。我们在建设强势话语平台时,一定要在用好传统媒体平台的同时,始终瞄准新媒体业态的发展前沿,以确保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平台能不断占领技术制高点。

3. 凝练好话语主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是获得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根本方法。

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高水平的理论队伍以及强势话语平台,还不等于就能拥有强势话语权。这是因为,话语权的强弱大小主要取决于话语思想的力量上,取决于其能否确立历史真实、直面现实和把握未来。这就需要凝练好话语主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

其一,凝练好话语主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凝练,“应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4]。这是因为,当代中国

[1]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北京]《求是》2009年第9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

[3][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板,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而,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凝练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的议题空间。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党的执政理念通过经济话语深入人心。“商品经济”、“下海”这样的经济话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接受。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等话语显示中国走上了稳定的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以共同的利益诉求构筑共享的价值,成为凝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方向。“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科学发展”等成为得民心、顺民意的流行话语。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四个全面”、“中国梦”等话语,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主流话语。

其二,把握好话语导向。所谓好的导向,一定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的科学话语。能够引领舆论朝着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话语导向,并且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运用得当,就一定能够牢牢掌控国内的思想舆论斗争,而且能够在国际思想舞台上也有所作为。其关键在于,要“以理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提出问题、设置议题,对我们面临的重大事件课题发出决定性的声音”^[1]。正如毛泽东指出:“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们不仅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2]当前,在我国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趋势日渐凸显的形势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了多元、多样、多变、多维的差异性发展态势,其中不乏暗含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抵触^[3]。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话语,有针对性地回应和解答人们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价值冲突;要求我们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战争中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将军”^[4]。

其三,贴近话语对象。贴近话语对象就是要贴近国情、社情、民情来设计议题,否则就会犯“对牛弹琴”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切忌自说自话、自弹自唱”,就是要求根据话语对象的身份、职业、知识结构、政治阅历、国别、环境等特点,而不是依照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如是则必定是不受欢迎的大话、空话、套话,那样的宣传话语势必变成自说自话,不仅不会说服人,在国际上还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对于政党来说,建构强势话语权离不开话语对象——人民的广泛认同。人民常常被喻为“载舟的水”、“种子的土地”、“枝叶的根本”。贴近话语对象,要求意识形态话语既要体现国家性质、社会发展的“大事”,也要体现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比如,在中美关系上,我们顶住了“大国政治的悲剧”^[5]所昭示的国际关系话语固有的“冲突-对抗”模式,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话语;再如国内政治生活中,我们提出了“中国梦”等共建共享价值的话语,道出了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诉求,因而成为极具传播力和价值影响力的话语。

[责任编辑:史拴拴]

[1]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贵阳〕《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2][4]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3]吴学琴:《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流行语的变迁》,〔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5]《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 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作家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力作。该书的中心思想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包括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守夜人,国家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国家对它们不怀敌意。因此,它们必须做好准备,应付来自各方的危险。其理想的结果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个国家能获得全球霸权,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难于越过如大西洋、太平洋那样的大片水域而投送力量。